

封面·学者讲堂

名师在谈

网络之镜可映君心?

——对话谢维和教授

刘明堂

编者按

《镜子的寓意——网络社会与教育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是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的一部新作。在这部著作中,谢教授以镜子作比喻,从“分人”“分语”等角度分析了在网络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带来的教育问题,并借鉴社会实在论的观点,提出将虚拟空间的知识与现实空间的知识统一起来,进而实现“破镜重圆”。近日,本报邀请该书责任编辑刘明堂与谢维和教授围绕本书中的一些新观点进行了对话。

1. 人的发展应该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问题

刘明堂: 在当今的教育信息化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信息技术变革给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教育如何适应信息技术的变革,进而培养能够适应和促进信息技术发展的人,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您在《镜子的寓意——网络社会与教育变革》一书中,把关注点聚焦到了人身上,去探讨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教育变革问题。这种视角的转换,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维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本书思考与写作的初衷。这种视角的转换首先应该是教育信息化本身的发展,以及教育实践本身的内在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开始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也写了一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信息技术变革对教育的影响及其变化。

但我越来越觉得,人的发展应该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问题。从目前的发展和自己的研究看,教育信息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概括地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是教育信息化的工具形态,指的是信息技术作为教育的工具对教育活动的支持与帮助,包括改善教育的手段与方法,提供教育管理的新途径,以及提升教育评价的效能,等等。例如通过教育信息化,建设国家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公共体系,改善教育环境,推动课堂形态的更新、教师角色的拓展与教学模式的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评价体系的创新,等等。这些都非常有效地推动了教育的创新发展,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第二是教育信息化的知识形态,指的是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取代了社会中现有的某些技能与职业,由此,什么知识是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知识,以及重新确认现代学校教育应该传授的知识与能力,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性与意义所在,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第三则是教育信息化的社会形态,指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催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网络社会,它是一种以数字化、虚拟空间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新的社会形态,由此对教育的根本任务——帮助和引导人们认识自己——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新意,其实只是把教育信息化的问题带回了教育本身,带回了人的发展本身。因为,人的

成长与发展应该是教育改革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信息化的根本问题。没有人,教育信息化也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教育信息化的工具形态应该是帮助人,而不是贬损人;教育信息化的知识形态应该为了人,而不是挤对人;教育信息化的社会形态应该是彰显人,而不是遮蔽人。当然,教育信息化对人的影响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突出表现在对人的自我认同的机制与路径的影响;在网络社会中,人如何认识他/她自己,以及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与网络社会的形成,教育中自我认同的机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实事求是地说,现代社会中人对自我的认识与把握,或者说自我认同的危机是教育所面临的最根本性挑战。

刘明堂: 您在书中用“镜子”作比喻,来阐述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的自我认同所面临的不同环境,这是一个很形象、很确切的比喻,使得原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变得生动起来,也更容易使读者理解其中的思想观点。您是怎么想到用“镜子”来作形象比喻的?

谢维和: 这个比喻源自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他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认为,社会本身是人们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人正是通过与他人交往与互动,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期望与评价等,实现对自己的认识。而网络社会正是一面这样的镜子,特别是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形态与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揭示网络社会这面镜子的特点,特别是它对教育与人的自我认同机制的影响,是教育研究的责任。

当然,自我认同机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过去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经写了一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讨论了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机制的变化,许多学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自我认同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许多论述往往比较艰深晦涩,不容易理解。有些说法又流于简单,以至于产生误解。我之所以选择库利的“镜中我”进行说明,是希望能够比较准确而又能深入浅出地说明自我认同机制及其变化,让自我认同的理论能够得到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接受与认可,进而进一步推动教育与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2. 网络社会人们需要学习思维能力

刘明堂: 在您看来,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网络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这一特点给教育带来了什么机遇与挑战?

谢维和: 网络社会是一种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是一种正在生成、我们尚未充分认识的社会形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社会形态,那么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以及机器的发展,人们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云技术与各种虚拟技术的发展,人们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思维空间,这是一种非常根本性的变革。如果说,人们在工业社会中需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技术与工具,能够有效地使用机器,进而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与发展前景,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那么,在网络社会,人们则需要学习更多的思维能力。而这恰恰是网络社会或者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最大的挑战。当然,这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极好的机遇。我曾经在给学生的讲座中多次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网络社会中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而应该更多地重视思维能力的训练与思维水平的提高。没有思想的发展,网络社会为人们提供的无限的思维空间将失去意义。没有思维能力的提高,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

刘明堂: 在本书中,您从“分人”现

象和“分语”现象入手,分析了教育的非连续性,包括知识的非连续性、学习的非连续性和师生关系的非连续性等方面,由此提出在网络社会中,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学以己”可能会演变为“学以己无己”,您认为我们当前的教育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来避免这种“退化”?

谢维和: 教育领域中的各种非连续性,实际上反映了网络社会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非连续性,由此甚至导致了青少年学生找不到自己。将当前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与现象概括为“学己无己”,并非是一句“脏话”。有些青少年学生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沉迷于电子游戏不能自拔,忘我于虚拟空间而难以自省,以至于成了网络的“奴隶”,进而失去了自我。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弱现实感”。我们的教育虽然应该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认识自然界、认识社会,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应该帮助和引导学生认识自己,实现自我认同。从教育理论来说,教育应该更加强调和引导学生发展一种自觉性与自制力。这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教育活动最基本的规律。对此,中外著名教育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一点。这也恰恰是最基本的德育,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此,教育改革应该在课程、教学与管理等方面努力建立起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连续性,增强青少年学生的现实感。



选自《镜子的寓意——网络社会与教育变革》插图

3. 虚拟与现实世界“破镜”终将重圆

刘明堂: 您借鉴了迈克尔·扬的社会实在论观点,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探讨“破镜重圆”的可能性,也就是虚拟世界中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的知识的统一性问题。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镜子”可能会更加多样化,“镜子”也可能更加破碎,那么这种统一性是不是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而使得“破镜重圆”越来越不可能呢?

谢维和: 的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形态与特点,知识的存在方式也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或者说,网络社会这面镜子将形成更加丰富的“镜面”。这种分化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由此,教育的连续性与知识的统一性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网络社会中,教育应该进一步关注虚拟空间与网络世界中的各种知识形态与学习方式,改革与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新的课程形式与教学方式,等等。教育的理念与模式也需要进行某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仍然有待于大家深入、持续的实践与研究。但我始终相信,网络社会中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一定能够协调起来,教育中的各种非连续性的现象也一定能够获得新的秩序,“破镜”一定可以重圆。

技术与制度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最根本的力量,而科学技术则是第一生产力。教育一定要拥抱信息技术的发展,敞开胸怀接受信息技术的到来。从前面概括的教育信息化的三种形态看,教育不仅要借助信息化的工具与手段提高教育和学习效率,而且还需要厘清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知识的问题,重新调整与更新我们的教育教学内容与知识体系,重视思想与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帮助引导儿童和青少年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纠缠的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在各种差异化的人际交往与互动中,在不同的角色扮演里,不断提升认识与把握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许多值得我们认识、学习与弘扬的内容。例如,“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自力者立”等,都是十分精辟的观点。因为,只有这种充分全面认识自己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和智慧的人;只有能够把握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只有能够自力更生的人,才是真正自立的人,等等。

刘明堂: 在本书中,您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叙述您个人的经历,您认为个人经历对自我认同或者个人社会性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谢维和: 是的,个人经历及其反思对自我认同的影响是十分重要

的。研究自我认同同样需要将自己的自我认同放进去。教育是一种需要特别关注人、关心人的活动;教育研究也必须是有人味的。就像艺术家要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自己作品中一样,教育研究人员也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与情感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尤其是自我认同的问题,如果研究者自身缺乏一种对自己自我认同过程的反思与批判,不能够设身处地或真心地分析自我认同的机制与各种现象,他是很难真正理解自我认同的,也难以发现与诠释他人的自我认同。

所以,我认为,人的自我认同必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定是一个个体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没有自我参与的自我认同是虚假的。我自己的人生中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坦率地说,这个过程有时候是比较痛苦的,但也是很有趣的。我也常常为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纠结过。有些人也对我自己人生经历中的各种行为做过不同的解读和评价,我也曾经为“镜子”中这些不同的“我”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形象”犯愁,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刘明堂: 您有着很深厚的哲学功底,您认为在这个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哲学研究对社会的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在您看来,哲学或者教育哲学在教育信息化方面,需要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

谢维和: 哲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是人与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种生存方式。尤其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哲学常常能够帮助人们不忘初心,回归初心。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角度看,哲学或者是教育哲学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与使命。它应该引导教育能够始终遵循自身的规律前行,能够从各种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幻象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本质,不断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平衡与协调。

其实,从科技史的角度看,科技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上关于科技的哲学讨论,包括科技与哲学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更加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引领教育信息化的创新与发展,实在是教育哲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说,当前在这个方面已经存在或正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现象,教育实践也正在一些未置可否的技术议题或选择中徘徊。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在这个方面已经有所作为了。许多教育哲学的学者在积极参与、深入研究和系统思考的基础上,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履行自身的责任,引领着中国教育的发展。

我读《史记》的原因很简单,为了给女儿讲故事。

女儿小的时候,总缠着我给她讲故事。童话、神话、寓言讲来讲去便黔驴技穷了,于是去《史记》里找故事,现学现卖。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不需要讲故事了,但我还在读,并试着用《史记》原文给她讲人物。周末,我讲,她听,兴致勃勃,这也算是家庭的一件乐事。

《史记》在中国史学与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有人统计,书中记录的人物就有四千多个,形象鲜活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个。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一部《史记》就记录了三千年的历史。如果说《左传》是以叙事为中心的典范,那么《史记》就是写人为中心的顶峰。正如韩兆琦先生所言:“司马迁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读史、读人、读故事,一部五十二万多字文言文里全有了。

起初,读《史记》只是为了找故事,选择孩子熟悉的“将相和”“完璧归赵”“毛遂自荐”“围魏救赵”“荆轲刺秦王”等史记故事与孩子边读原文,边演绎故事。这样下来,列传部分基本浏览了一遍,对于经典的本纪如《高祖本纪》《项羽本纪》也多次翻阅。

在孩子升入初中后,自己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便计划把《史记》精读一遍。我仍从最经典的七十篇列传入手,用一种最笨的方式——手抄、通译加书评。

买来一摞学生练字的牛皮面的米字格本,找来一支好钢笔,选了一种好墨水,每周“攻”一篇传记,这里头的“攻”包括正楷抄写,通读注释,能通顺朗读原文,品味作者的选材、谋篇、用词、评述之美。最后,还要尽力写一篇粗浅传记书评。这样边抄、边读、边译、边写,进度很慢,但我喜欢这种慢阅读。甚至,为了接近原文,我把现代的横向书写改为古文的竖向书写,把标点有意弱化或隐去,以此来品味古文的句读之美。

“攻”史记不仅要有态度,还需要必备的工具。我手边有若干种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的版本。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繁体竖排十卷本,每册很小,古香古色,我只要外出,都要带上一册。我平时抄书用的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字注音全本。字硕大,有拼音,看得清楚,适合朗读。还有就是岳麓书社韩兆琦先生评注的三卷本。注释完整,篇尾有总评,是一部很好的本子。当然,研究《史记》的人很多,也出版了很多研究的书籍,这些都可以选择一些作为辅助阅读的资料用书,比如日本山崎正的《〈史记〉人物四十五讲》,宫崎市定的《宫崎市定解读〈史记〉》,韩兆琦的《〈史记〉精读》《〈史记〉讲座》,吴淑惠的《〈史记〉论析六章》,严安政的《〈史记〉大事年表》等。

之所以用这种费力费时的方式去阅读此书,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当作纯粹的历史或文学来阅读,而是把它当作

一线行动

三峡大学: 读书会育人第二课堂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魏瑶 李慕钧

“读了《第二曲线创新》,我的体会是,确定清晰的目标,找到自我优势和闪光点,完成自我使命,实现单一要素最大化,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从一个跑步机跨越到另一个速度更快的跑步机上……”

这是三峡大学“海星盛宴”第19场读书会暨2021年首场读书会的交流现场,20多名主要从事药物绿色合成工艺、药物化学等学习研究的研究生,分享着著名企业家李善友写的《第二曲线创新》。从企业的创新发展,谈到个人的成长成才,很快附近图书馆里的不少学生就被吸引了过来,把读书会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这个读书会是由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学院绿色制药团队的导师和研究生自发创建的,但所谈之书却与他们的所学和科研相距甚远,因此被学生们戏称为读“闲书”的读书会。

为什么要读“闲书”?这是读书会发起人之一、生物与制药学院绿色制药团队导师周海峰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近年来,周老师关注到,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因为学业压力大、心理问题较多,负面情绪长期积压无法排解,最终导致某些极端事件的发生。每每看到这些新闻,他都感到痛心不已。

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永远是老师第一位的工作,而研究生导师更是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周老师深感责无旁贷。结合自己指导学生的经验,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学生的思想根源上下功夫。

雨果说,书籍是改造人类灵魂的工具。周老师与另两位导师商量后,他们决定通过读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表达沟通、人际交往、解决问题等可迁移技能,拥有更开阔的格

有滋有味读《史记》

常亚歌

“语文书”“历史书”“文学书”甚至是“中国人文史”来读的。

教师的阅读,出于工作的需要,应该精读一些代表性的教育经典,通读一些学科类的代表著作,这些都是教师专业发展底色的书籍。但,我也更主张教师应该精读或读通一两部影响中国人精神发育的经典之作。近些年,我在阅读上很乱,甚至把百部近代人物传记作为去年的阅读功课。但我有一个基本阅读定位,就是读任何一部书极少把它以图书分类的标准严格划分。任何一部书,对我来说,都是不断构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影响我的世界观与教育观。比如阅读《李宗仁回忆录》,我把它看作一部中华民国的微缩史,从中可以看到民国中的中国。我读《史记》也是如此,我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篇篇独立的人物传记,而是通过它看到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的历史长河中,那千百个向往自由的读书人,他们纵横于中原诸侯之间,为自己、为国家、为理想的坎坷经历与社会百态。他们中间的很多观点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如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他们个个胸怀天下,侃侃而谈。他们中间或为保命而弃家,或为理想而革新,或为强国而征战,或为宣道而辛劳。这些人,或立德建功,或拓边固国,或言传天下,或遗憾终身。这些人,无论大小,都意气风发,包含着一种向上的精神。小国不屈服,智者出谋,勇者出力。大国难独行,忠臣劝慰,弱国合力。

我读《史记》的目的很单纯,没有他人的指点,完全信马由缰,但我有兴趣去啃读它,去分享它,这也算是一种读书之乐吧。

(作者系河南省济源示范区教育体育局名师培养办公室主任)

局、更强大的内心,可能短期内效果不太明显,但对学生今后的成长成才定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2019年9月,“海星盛宴”读书会正式成立了。海星是一种受了伤也能迅速再生、生长力极强的生物,教师们希望学生像海星一样具有顽强的生长力。

读书会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师生一起阅读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非暴力沟通》《5G时代》《活法》《干法》《坚毅》《思考,快与慢》等20多本书。

读书会最初的半年时间里,是3位导师担任主讲。他们一起学习了《匠人精神》《墨菲定律》《万古江河》等,学生们感受到了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明白了必须学会接受错误并不断从中学习成功经验的道理,感悟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和理性思辨,也会体会到导师们的一片苦心。

余涛同学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的人,但经过读书会,我逐渐发现了读书的乐趣。无论是自己读,还是与他人分享交流感悟,都使我的思想、精神更加丰腴。”

卢大顺同学说:“读书会上,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讲得不好,会后反思总结,讲得好,争取下次讲得更好。怎么理清思路、克服紧张、化繁为简、突出亮点,都是一个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

学生们反映,参与读书会以来,最直接的收获是拓宽了眼界,了解了专业以外的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等知识,提升最大的能力是交流思辨和表达能力,从最开始发言时,只能磕磕绊绊地说上几句简短的话,到现在能流畅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